

薛理勇
著

被误读的 上海老照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薛理勇
著

被误读的 上海老照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误读的上海老照片 / 薛理勇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58-0697-7

I. ①被… II. ①薛…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图集
IV. ①K29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067 号

责任编辑 张允允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 懿

被误读的上海老照片

薛理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 / 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50,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97-7/K · 98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1839年1月9日，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达盖尔(Louis-Jacques Mandé Daguerre)在法国科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把一块涂有碘化银的铜版曝光，然后用水银蒸气熏，再用普通食盐溶液定影，就可以得到能够永久保存的影像，此方法被命名为“达盖尔式照相法”(daguerreotype)。于是，1839年也被认为是世界照相技术的诞生年。当然，照相技术从实验室到被人们推广使用，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广州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如果讲，西方的照相最早传入中国的广州，此说不为过。周寿昌(1814—1884)，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1846年曾游历广州，其著《思益堂集》卷九《广东杂述》中记：

奇器多而最奇者二。一为画小照法：人坐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

这就是用“达盖尔照相法”拍肖像照，成影的画面直接在“镜”(可以是铜版，也可以是玻璃，文中称“镜不破，影可长留”，此“镜”应该是玻璃)，“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即拍照必须在上午的7时至11时，而且必须在强阳光之下，因为到了中午，阳光直射而成顶光，当然拍不成好照片了。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甬直)人，1849年应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恩之邀入上海墨海书馆，为近代著名报人。其《蘅华馆日记》许多次提到上海拍照相事，其中“咸丰九年二月九日(1870年3月2日)”中记：

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住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在焉。画师罗元佑，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授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明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

“星使”通常指钦差大臣或驻外公使，“桂、花二星使”即兵部尚书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均为满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58年作为钦差大臣与联军谈判，并与各国签订《天津条约》，11月在上海分别与英、美、法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挂在上海老城厢照相馆里的照片应该就是1858年11月他们来上海时拍的。所拍的照片至少一份要给客户，而他的店里还挂了一份，说明，此时的照相已使用底片，再用底片可以洗影或放大许多张，所以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讲：“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此种照相使用玻璃底片，再通过玻璃底片将图像印到照相纸上。

王韬提到摄影师罗元佑，他原是旗昌洋行大股东，上道道台吴健彰的会计，吴健彰是1851年至1854年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去任后他就向西人学习照相，如此看来，至迟在1850年之前照相已经进入上海，不久上海就有了照相馆。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完整的《工部局会议纪要》，在1860年的记录中，工部局委员们多次讨论，为了确保侨民的安全，建议侨民在雇用中国佣人和帮工时，尽量把佣人和帮工的照片和资料送工部局相关机构备案，看来，当时拍照的费用“价不甚昂”，上海的照相馆也不会少。

早期的照片或底片感光速度慢，不会超过后来的8定底片，必须在强光、大光圈、慢快门的前提下才能成影，并且以拍摄静物为宜，大多拍室内的肖像照，为了获得足够的阳光，照相馆大多设在楼上，四周为可以活动的窗户，屋顶设计为可移动的天棚，所以，早期上海的照相馆大多被叫作“照相楼”；拍野外的风景照时，必须择合适的天气，并以不动的建筑物为主。本书《释“The Original Garden Bridge Shanghai, About-1880”》一文中收录一张早期拍摄的外白渡桥照片，就很明显有一人闪动而留下模糊的人影，这就是相机快门速度太慢而产生的效果。

户外摄影的难度大、成本高，能留存至今的很少。二十几年前我在一

本 19 世纪末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上见到一张照片，该杂志说，这张照片拍于 1856 年，是一位德国人站在南京路外滩拍虹口风景，并认为是他们所知道的上海第一张户外拍摄的风景照，但不知这张原照片在哪里。陈波先生是上海人，自己开一公司代理意大利几家庄园的葡萄酒销售，而这位庄园主又有一个朋友收藏了不少上海老照片，并正计划写一本关于上海建筑的书。他传给陈波一张照片，希望请上海的专家辨认照片拍摄时间和地点，于是又托人找到了我。传来的照片影像稍模糊，似乎焦距也不准，但还能看出个大概。我和陈波均不知道，是原照片就是这样，还是传真上出了问题，但是我还是根据照片告知对方——这张照片拍摄地是上海外滩，时间估计在 1859 年。后来陈波先生告诉我，那位意大利照片收藏者听到这个答案惊呆了，并通过陈波转告，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传教士，就是 1859 年在上海的，这照片也是他拍的。如果此事确实，那么，这张照片就是我知道的保存至今的上海最早的风光照。

照相是艺术品，也是商品。在本书《上海二处淞沪路火车站》一文中会讲到，1876 年 7 月 3 日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通车，各报记者争相采访，但是几乎上海的所有报社都没有摄影部，也没有摄影记者，如此重大新闻事件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于是《申报》老板美查就指示报社请日成照相馆去补拍，但开幕式已经过去，怎么才能制造出火车通车开幕式的热闹场面呢，7 月 15 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拍火轮车”的广告和预告，告知市民定于某日某时，日成照相馆带照相机到火车站拍照，希望市民加入这一活动。《申报》有了照片也无法印到报纸上，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正如该预告中所讲：“本店现蒙申报馆主托照上海至吴淞火轮车影像，以便装潢寄发各埠”，这些照片可以随《申报》寄发给固定的订户，是一种附赠品、礼品、宣传品。所以，同一张照片在多人手中收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如今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偶然发现某外国人家中收藏了许多在中国拍摄的历史照片，就武断这就是这外国人祖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为这些照片出版“个人摄影专集”——此法不可取。

能把照片印刷到报刊上是 19 世纪末的事，为了把照片的写真功能和作用在杂志上体现出来，19 世纪中后期后，上海委托欧洲印刷、装订的杂志通常采

用二种办法，其一就是将照片寄往国外，由当地印刷厂根据照片制成铜版后印到书上，这种铜版画与照片很像，但在制版过程中，雕版师会对画面作调整和修改；其二就是在杂志上“开天窗”，然后再将放印的照片贴到“天窗”上。我见到过这种杂志，有的杂志上的照片已被人揭去，只留下一个“天窗”和下面的照片说明，有的照片还在，但早已褪色而看不清影像，估计，此类照片冲洗时很马虎，系定影时间不足或定影水失效而造成的。

到 19 世纪末，照片才可以成为印刷品，到 20 世纪初，上海英商别发洋行 (Kelly & Walsh, Ltd.) 德商璧恒公司 (Nosslet & Co., Max)、日商鸭川洋行 (Kamogawa & Co.) 等以经营图书、文具为主的商行开始制作以中国风景、风情为图案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大多在国外印刷，世界发行，又以上海为主要发行地。附有照片的书籍报刊的销售会更好一点，此后许多书籍报刊上印有照片，上海还出版了无数以图为主的照片集。

我长期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工作，从事上海历史研究，而照片就是珍贵的历史瞬间和资料。由于底片不易保存，当时人也不将底片作为必须保存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是以照片来分类的，我单位的老同志们将其分为“第一片”、“第二片”等。“第一片”就是原始照片，也就是当年拍摄后就放大冲洗的照片，一般被视为“文物级”，其珍贵程度视拍摄的时间、地点、内容、保存情况而定；“第二片”即“第一片”的复制品，其有较高的史料、观赏、收藏价值，但不作文物对待；“第三片”为照相印刷品或其翻印件，其无收藏价值，但“第三片”一般有对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内容有说明，其历史、文化、资料上的价值更高。

近来，照片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已被人们认识，大概在八年前，一张长约 80 公分，宽 15 公分的 1923 年外滩全景照“第一片”在某拍卖会上以 16 万元人民币被某房地产商拍走，我为之咋舌，而如今的上海市场，一张素不相识的民国时期的 8 英寸全家福可以卖到千元。

照片的价值除了照片的本身外，而更在于照片的内容，于是，识别照片、释读照片、破译照片也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许多照片的识别难度不亚于破译、识读甲骨文，拙著只是自己从事上海史研究的经验之谈，也

许可以为上海历史老照片的收藏者、爱好者、使用者提供一个进入门径的方便之门，而想要达到一定的水平，那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须努力”。

薛理勇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写于秋月枫舍

目 录

自 序.....	1
外滩 14 号的前世今生	1
“汇中”的历史本相	6
外滩 30 号	12
传闻背后的真实——中国银行大楼	19
纸钞上的建筑.....	24
舢板厂和划船总会.....	31
一张“新天安堂”的历史照片	37
洋泾浜天主堂和基督教圣三一堂.....	41
浦东的“海员教堂”	45
上海的“锡克庙”在哪里	48
“上海神社”何处是	52
话说“上海议事厅”	57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大楼.....	63
被误释的“福利公司”	69
汪裕泰茶号第一发行所在哪里.....	73
被误读的斐伦路发电厂.....	76

陈公馆和药水厂·····	80
一张苏州河北岸虹口的老照片·····	85
上海的“自来水桥”·····	89
最早的“老闸桥”·····	96
“铜人码头”照片·····	100
上海有二处淞沪铁路火车站·····	105
从“劳合路”说起·····	111
“宝昌路”的来龙去脉·····	115
珍贵的“饭店弄堂”留影·····	120
顺便介绍番菜馆·····	124
被遗忘的“汇司公司”·····	128
天官门神变成了弼马温·····	131
旧上海的“法兵墓”·····	136
一张外滩鸟瞰照片的拍摄年代·····	140
上海的粪码头·····	143
上海最早的“给水站”·····	146
照片上的西藏路煤气公司·····	152
洋泾浜的“长发栈”·····	157
苏州河边的“华人公园”·····	161
被误识的上海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加冕照片·····	163
几张“端阳竞渡”的历史照片·····	166

外滩 14 号的前世今生

这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老照片，曾在该馆的展厅中多次长期陈列，原来的说明很简单，为“19 世纪 80 年代的外滩”，后来，该照片被许多种画册、书籍、刊物使用，说明依然那么样的简略。实际上有许多人来问我，这张照片拍的是外滩的哪一段，凭什么断定它拍摄于“19 世纪 80 年代”？这确实是一个有趣，而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



19 世纪 80 年代外滩。左边第二幢建筑即汇丰银行。

我们必须熟悉不同时期外滩的建筑形态和特征，才能识别不同时期的外滩照片。

这张照片从左向右的第5幢有较明显的特征——这是一幢四层半(假五层)的西洋建筑，三层与四层之间有明显外突的腰线，假五层上为四坡顶，屋檐挑出墙体较多，这在上海的西洋建筑中并不多见。我们可以找到多张这幢建筑的照片，二者比较后，你一定会认同它俩是同一幢房子，而这幢房子就是外滩14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就是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或交通银行总行所在地。

看过电影《林则徐》的人也许还记得，林则徐赴广州禁烟时，一个英国商人无视林则徐的三令五申，继续干鸦片走私、贸易的勾当，林则徐下令查封洋行，收缴鸦片，拘捕了这个英国人。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鸦片走私商——颠地·兰士禄(Lancelot Dent)。颠地于1830年在广州创办颠地洋行(Dent & Co.)主要从事鸦片贸易。1843年上海开埠后，他又捷足先登，抢滩上海滩，分二次购进了今外滩14、15号的地块，它拥有的道契编号为“第壹号”。颠地除了从事对华的鸦片贸易外，还参与欧洲的股票、证券交易，而在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中，颠地受到重创，蒙受极大的损失，1867年宣告破产，他在上海外滩的地块就落入他人手中。照片上的这幢建筑约建于1880年，由新宝顺洋行(Dent & Co., Alfred)出资兴建。

在上海开埠后的若干年，德国的对华贸易额不断上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就在上海设立分行，1889年，德意志银行又联合德国的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科隆、慕尼黑等地的13家银行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总行设在上海，在中国的天津、汉口、青岛、香港、济南、北京、广州等城市，以及柏林、汉堡、加尔各答、新加坡、横滨、神户等世界城市设立分行，他们就购进了上海外滩14号的产业，1900年元旦正式开业。德华银行使用的建筑建于1880年，当时上海的经济尚属于起步阶段，进入上海的侨民中，真正能称得上建筑师的人并不多，侨民在上海造的房子大多参照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建造的建筑，与英国相比，东南亚一带气候炎热，于是，英国建筑到东南亚后就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人们喜欢把这一类建筑称之为“殖民地建筑”或“东印度式建筑”，这种建筑一般设计为坡度稍平的大

屋顶，屋檐挑出较多，起到遮阳避雨的作用，每层设计有游廊，有良好的通风作用，夏天，可以避免强光直射室内，冬天，则又可以起到保温作用。

德国对华贸易发展很快，而且，德国对华贸易中军火贸易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也使德华银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成了上海重要的外资银行，银行希望增加大楼的使用面积，但又舍不得将房子拆掉，那只能改造和增建了。改造工程于 1902 年开始，由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贝克（Heinrich Becker，他在上海有不少作品，如今福州路 70 号的原德国邮政局大楼，外滩 15 号的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等）主持。由于建筑南临的汉口路不齐整，无法将建筑的南立面拉直，于是海因里希就利用这个曲尺的地形增建了一个塔楼，塔楼与原来的主楼形成一体，直到今天，这个痕迹依然存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 年中国对德宣战，根据国际惯例，德国在华的侨民将被视为敌对国难民驱逐出境，德国政府在华企业将作为敌产被没收，德华银行撤离中国，上海外滩的德华银行大楼被中国政府没收，旋归交通银行作为上海分行行址，1928 年交通银行总行迁上海，这里又成了总行行址。1948 年，交通银行将旧建筑拆除重建，并于 1949 年初封顶，银行在进行内部装修时——上海解放了。此后，外滩 14 号大楼长期为上海市总工会总部机关所在地，称之“总工会大楼”。

确定了该照片的第五幢房子是外滩 14 号后，那其左侧，即第四幢房子就是外滩 13 号，也就是江海北关，外滩的海关始建于 1846 年，是一幢传统的中国衙署建筑，飞檐峭壁，在外滩的建筑群中个性尤为明显，海关建筑于 1891 年拆除重建，1893 年落成；1925 年又拆除重建，于 1927 年落成。在这张照片里依稀能见到海关建筑中的飞檐。

由于外滩的一侧临黄浦江，只有一侧有建筑物，所以外滩的门牌编号较特殊，无双号单号之分，至迟从 19 世纪后期起，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向北，以一户一号的办法连续编号，今中山东一路最大的门牌号为“33 号”，说明当初编门牌号时外滩沿线共有 33 幢房子，而如今外滩实际上只有 24 个门牌号，其中 4、8、10、11、21、22、30、31、32 号是空号，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一种就是原来的房子被拆掉后没有重建，而另一种就是几幢房子拆除后在原地

建造了更大的房子，而后一种的现象更多。从福州路到汉口路的外滩以前占了10、11、12、13号四个门牌号，其中12号是汇丰银行，13号就是海关，那么，照片中建筑体量最大的建筑就是12号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是由香港和上海的多家洋行为了香港与上海，以及香港与上海的转口贸易而集资创办的外资银行，英文名 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另取华名“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于1865年4月3日租南京路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组为“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南楼）开业。汇丰银行一直希望在外滩有自己的行址，这个愿望一直到1873年才得以实现。

在此之前，侨民在上海有一个叫“体育运动事业基金会”的组织，在外滩12号建有会所，还有一个面积不太大的室外运动场。一方面，这个基金会财务上出了些问题，另一方面外滩的地价不断攀升，把一个运动会所建在寸土寸金之地的外滩实在也不划算，他们就将这里的土地转让了，这块地曾归入美商花旗洋行名下，1873年又归汇丰银行所有。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二（1874年7月15日）《申报》发表题为《汇丰行新建大厦》的报道，说：



从正面拍的外滩，从左向东的建筑依次为：汇丰银行、江海北关、德华银行。其中德华银行的建筑就是上图中提到的建筑。

上海汇丰银行现在黄浦滩路海关间壁建造大房一座，其工虽尚未完竣，亦已可具其大概矣。计房高三层，每层俱高大之至；其内房屋亦皆高敞广阔，迥异寻常；房外，砖柱凉台皆雕饰壮丽，几至陆离满目。此诚为浦滩上所创建也。向来，丽如银行之房，夙称甲于上海，此后得汇丰大厦落成，则丽如之房不得专美于前矣。闻此房用银已六七万两，所购花旗洋行基地亦曾付六万两矣。然则此银行能支银至于如此之大，亦足见其充裕之一斑矣。

文中讲的“凉台”应该是门厅或雨棚，呈外突的半圆形，有四根砖柱支撑，而门厅的上面与二层的房子相通，设计为“凉台”。记者称，在此之前丽如银行的房子称雄外滩，而汇丰大厦建成后，就是外滩最壮观的建筑。从此一描述中，大概可以感悟到上海外滩早期建筑之大概。

汇丰银行的业绩不错，很快就成了上海最主要的外资银行，也许他们认为原设计的门厅过于“秀丽”，缺乏阳刚之美，也许考虑到底层的营业大厅过于局促，大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又将圆形门厅改建为方形，从建筑的角度上讲，其更合理和壮观了。当然，汇丰银行门厅的形式也成为判断外滩历史照片的依据或参数之一。

到 20 世纪初，与外滩 12 号相邻的 10 号和 11 号，也即该照片中的第一、二幢房子分别是挪威顺享洋行（Thoresen & Co., O.）、英商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等商事机构的办公用房，后被汇丰银行收买，连同原 12 号的地基一起重新新建的汇丰银行大楼，于 1921 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破土，1923 年 6 月封顶。

综上所述，这张照片确实拍摄于 19 世纪 80 年代，照片中的建筑相当于今福州路至汉口路的外滩。

“汇中”的历史本相

这张照片颇有异国情调，如不加细心辨认，也许你还以为是外国的某个城市风光，而你认真细看后，你就能发现，街上行走者大多是拖着长辫、清朝打扮的中国人，而在左侧建筑物的转弯角落底层的中部还有二块路牌，一块的字迹十分清楚，上书“The Bund”，这是上海“黄浦滩路”，也即今中山东一路的旧英文名，另一块路牌上的字不甚明了，但依稀能看出是“Nanking Road”，也就是“南京路”，毫无疑问，这里是上海南京路外滩，摄于清代。而具体拍摄的时间，那就得通过考证来确定了。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这一天也被侨民们视为“上海开埠纪念日”，对上海的侨民来讲，这一天就是他们的“国庆节”，于是，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而遇逢五、逢十更得举行大庆。1893年11月17日恰逢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当然，这一年的庆祝就达到了空前规模，《点石斋画报》还以“赛灯盛会”描绘和记录了庆典盛况，说：

本月初十日（公元1893年11月17日）为西国官商庆贺开埠五十年之期，由浦滩至大马路（即从外滩到南京路）一带，预由捕房竖立灯杆，上用麻绳牵连，悬挂各式旗帜及五色纸灯，沿途市肆亦皆悬灯结彩，斗巧争妍，盖以联中外之情，敦辑睦之谊也。是日清晨，西商团练兵及英、德、美兵轮船水兵荷枪拖炮，由兵官督率至跑马场操演各阵，毕，回至浦滨。

照片就记录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南京路外滩张灯结彩的场景。

在另一张比它拍摄得更早一点（1890年）的同一位置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左侧建筑的三层坡顶上写着CENTRAL HOTEL的大字，现在出版的一些著作或发表的文章中把它译为：“中央饭店”或“中央旅社”，而在早期的习惯译名中，



清代的南京路外滩。左侧的建筑上有 CENTRAL HOTEL。址即今和平饭店南楼。



南京路外滩，拍于1893年11月17日，这一天是“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祝日”，外滩一带张灯结彩。